

人文中國學報

SINO-HUMANITAS

第 十 二 期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人 文 中 國 學 報 編 輯 委 員 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文中國學報

素園題

第十二期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本刊稿件全部經過隱名評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人文中國學報. 第12期 /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9

ISBN 7-5325-4506-7

I. 人… II. 香… III. 社會科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11130 號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二期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14.375 字數 359,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100

ISBN 7-5325-4506-7

1·1888 定價: 49.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姓氏筆畫爲序)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宗哲系

朱益宜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宗靜航(執行編輯)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林啓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周國正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陳永明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黃國彬

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II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二期)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葛曉音(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鄭健行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人文中國學報》顧問委員會
(姓氏筆畫爲序)

安樂哲(Roger T. Ames)

University of Hawaii

吳宏一

香港城市大學

吳清輝

香港浸會大學

余英時(Ying-Shih Yu)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李歐梵(Leo Ou-fan Lee)

Harvard University

周策縱(Tse-Tsung Chow)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韋政通

臺灣文化大學

徐中約(Immanuel C. Y. Hs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孫國棟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

張玉法

臺灣中研院

傅佩榮

臺灣大學

趙令揚

香港大學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

劉殿爵

香港中文大學

謝志偉

澳門大學

顏清煌(Ching-hwang Ye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目 錄

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	李歐梵 1
--------------	-------

“大時代”裏的“現代文學”	王曉明 13
---------------	--------

重建“中國現代文學” ——在學科建制與民間視野之間	陳平原 25
------------------------------	--------

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	陳思和 47
-----------------	--------

歷史碎片以及中國詩的現代行程	黃子平 85
----------------	--------

論文

王國維(1877—1927)在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中的貢獻	張廣達 99
Wang Guowei's Contribution during Chinese Scholars Transitional Period	Zhang Guangda 114

宋代刻石文化與民間及官署刻工考	程章燦 115
The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Stone Inscribers and the Culture Context in Sung Dynasty	Cheng Zhangcan 150

- 《廣雅》同源詞考證 張其昀 151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Guang Ya* Etymological Doublet
Zhang Qiyun 181
- 給崇高理想與博大精神賦形和着色
——毛澤東詩詞藝術形象表現技巧概論 楊景春 183
Sketching and Colouring Lofty Ideal and Erudite Spirit: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s of Artistic Image
Expressions in Mao Zedong's Poems and Lyrics Yang Jingchun 206
- 文學無意構建“新滿洲”
——《新滿洲》雜誌考述 劉曉麗 207
Literature Had No Intention to Construct “New Manchou”:
Research and Recounting on “New Manchou” Periodical Liu Xiaoli 243
- 爐外之丹
——余光中六十年代“現代散文”的歷史意義 樊善標 245
Elixir outside the Furnac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Prose Written by YU Kwang-chung in 1960s Fan Sin Piu 272
- 上博簡《孔子詩論》與《詩經》成書考 王志 273
A Study on the Course of Editing the Book of *ShiJing* through
Confucius' Commentary on ShiJing from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Wang Zhi 296
- 決策訊息流與秦帝國衰亡的關係 馮樹勳 29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ow of Decisional Messages and
the Fall of the Qin Empire Fung Shu Fun 332

陽羨詞人蔣景祁生平事蹟補考	朱嶠磐	333
---------------	-----	-----

An Amendment to the Life of Jiang Jingqi, Ci-poet in the Yangxian School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h his Personal Genealogy Attached)	Zhu Guoxin	357
--	------------	-----

《莊子·外篇》詮釋《老子》考	鄭麗娟	359
----------------	-----	-----

How Did the “Outer Chapters” of the <i>Zhuangzi</i> Modify the Teachings of the <i>Laozi</i>	Cheng Lai Kuen	401
---	----------------	-----

書評

《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	區志堅	405
--------------	-----	-----

《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	陳漢文	419
--------------------	-----	-----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	梁萬如	429
----------------------	-----	-----

《逸園叢錄》	林英德	437
--------	-----	-----

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 李歐梵

這個講題其實是學生幫我起的。因為學生最想知道的，就是老師在研究方法上有什麼新的見解。今天我要講的是老生常談，通俗的講法是自我反思一下，因為我最近在美國的王德威安排下提出兩篇論文，一篇是講夏志清、夏濟安兄弟的；另一篇則是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反思文章。今天我想把這兩篇文章加上自己的感想來講一下。沒有講稿，只能算是閒談。

從專科的立場，我其實是外行，從一開始就是旁門左道。我在臺大念的是外文系，當時對中國現代文學感到非常的神秘。當時的臺灣，整個“五四”的傳統除了胡適、徐志摩的作品之外，其他的都不能看。所以第一年到美國後，在芝加哥念的是國際關係，我最感興趣的就是追尋被禁的文學，所以才開始看“五四”文學，而且第一個要看的作家就是魯迅。因為當時在臺灣大家都久聞其名，但卻都說他是洪水猛獸。於是我就開始看魯迅。看的方法是在暑假時每天下午都看他的一篇文章，一直看到他的翻譯，但他的翻譯卻看不下去，其他的都看遍了。魯迅給我非常大的震撼：魯迅其實不是那麼革命的一個作家，怎麼在中國卻被認為是革命導師？

從看魯迅到看茅盾然後看曹禺，感到茅盾和曹禺這兩位作家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寫欲望、寫言情、寫女性的身體非常大膽。當時我在臺灣初出茅廬，沒有想到中國小說有這麼大膽的描寫，才開始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生興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對現代文學的興趣，跟政治是完全没有關係的。我在臺灣還以

為“五四”文學，特別是三十年代的革命作家都是左派的、政治意識很濃烈的，沒想到政治表面之下還有其他東西。

後來我在哈佛念的是中國思想史，在哈佛的傳統中，我做學生的時候，根本沒有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因為哈佛在美國的漢學傳統和歐洲的漢學傳統差不多，主要指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等文學，最多談到中國古典小說。很多教授甚至認為中國自《紅樓夢》以後就沒有文學可以看的了，所以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根本不能成立。我就是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也沒有辦法去研究，只好退而求其次，研究“五四”作家和知識分子。當時人家都看同一本書，就是周策縱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五四”運動史》。大家都以為，“五四”就是這一批知識分子用作家的身份和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我開始對中國“五四”的傳統作研究，可是基本上卻是用歷史的方法。

要再三強調的是，我做研究生的時候，特別得到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教授的啟發。遇上夏志清先生在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時候，剛巧是我的摸索階段。想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卻不知如何着手，然後就開始看夏先生的書，一章一節地細讀。《中國現代小說史》現在由香港中文大學再版，即使現在看也有很特別的意義。六十年代我看這部書的時候，覺得夏先生非常反共，恰巧是我的思想開始左傾，受到美國的學生運動、美國反越戰所影響，覺得夏先生的立場和我的立場幾乎是格格不入，特別是對魯迅的看法。可是夏先生對少數幾位“五四”作家的作品卻有着非常獨到的見解，包括對張天翼、師陀、吳組湘、張愛玲、錢鍾書這幾位作家的作品，夏先生都對之作專章處理。當中突顯了兩種敘事的模式：一是半政治的、反共的歷史敘述；另一方面則是對文本的重視。

實際上目前可以不管第一層的政治意義，只管第二層意義——基本上是對一個作家的幾部作品作新批評式的研究。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震撼，當時我念歷史就不知道如何精讀；外

行人都覺得宏觀很容易、細讀很難。夏先生尤其對張愛玲、師陀讀得那麼細、旁徵博引的。夏先生所追蹤、所師從的是英美新批評，而這新批評具有很強的道德意義。我們當時所用的是同一種方法，認為小說背後都有很強的道德內涵，要從語言、角色敘述着手找到道德力量。從後現代的角度看來，這彷彿已經過時了。但兩年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學跟同學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如果這部小說不從道德的角度來講是講不通的。

另一位對我影響非常大的老師，就是夏先生的兄長夏濟安先生。夏濟安先生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用非常人性化的研究方法把左翼的作家還原到人的面目。我後來研究魯迅，就特別受他的方法所影響。還有來自捷克的普實克教授，當時我認為他是歐洲的共產黨，他到哈佛後我一直與他針鋒相對——他研究左派我研究右派，他講蕭軍我講蕭紅，故意跟他唱對臺；又故意研究徐志摩的新月派來對抗他的左翼研究。直至後來我才知道他最關心的是歐洲文學中二十世紀的抒情傳統，即主觀性（subjectivity），特別講到 Virginia Woolf 即現代主義的作家的寫作。普實克教授背後的學術傳統，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的學術傳統。布拉格學派也是從這個傳統出來並延伸到歐洲的。這時我才知道這兩位針鋒相對的教授，背後有着一脈相承的學術傳統。

這兩位教授對我的啓發相當大，我開始走上不歸路，自己卻是迷迷糊糊的、模稜兩可的。1970年秋，在香港中文大學開始任教時一方面在學校教歷史，一方面對文學的興趣愈來愈大。以至於到最後表面上是歷史系的小教授，心裏皈依的卻是“五四”文學。中文大學對我非常好，1971年的時候讓我在崇基學院講歷史、在新亞學院講文學，來回兩邊跑。從此便養成我的“歷史-文學”的分裂人格，並一直延續到現在。

讓我走上文學不歸路的另一個原因，是制度上的問題。那

時美國還沒有所謂跨學科式學科綜合的說法——要麼學歷史，要麼學文學。我在歷史系教書的時候，文學系的人認為我太歷史化，不懂文學；歷史系的人又認為我太文學，不夠歷史。當時我覺得那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低潮，歷史、文學不知如何兩全。我最感興趣的是魯迅的《野草》，寫研究論文寫了一個暑假，每天從早寫到晚，寫了三個月，最後全部丟掉。因為不知用什麼文學的方法來分析。可以說，《野草》是最沒歷史性的，最多找找魯迅背後的學術資源、他的個性、他的生活上的一些痕跡等等；他跟革命的歷史這一環卻非常單薄。

另一方面，我又對歷史的另一面感到非常人的興趣，受到兩位教授非常大的影響。一位是研究歐洲維也納思想史的教授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他是我的同事，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書叫《世紀末的維也納》。受到他的影響，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看了他這本書，還差點做了他的助教，才發現可以在歷史的範疇中討論音樂家、作家。因為他的書提及一位施鰲存很重視的作家顯尼志勒(A. Schnitzler)，還討論到建築學和各式各樣的東西。這本書對我的啟發是，如果歷史學可以寫世紀末的維也納，為什麼我不可以寫世紀末的上海？所謂“世紀末的上海”就是指清末民初的階段，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陳建華的研究範圍。當時我對清末文學一無所知，只知道我的老師史華慈寫過一本關於嚴復的書，我只接觸過林琴南的翻譯。可是我開始摸索一個非常粗淺的文化的模式，就是怎樣把文學和文化連接起來；當時我要探討的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講便是 modernity，就是現代性問題。可是當時一點也不自覺，因為沒有任何的理論基礎，不曉得怎麼研究這個課題。因此當我想要研究這個課題的時候，不知從何着手，結果這個研究計劃寫了半個世紀也沒寫完。我將來要研究的話，還是要研究這個題目，就是中國的世紀末，即清末民初這個時期。

後來我學不成歷史，又學不成文學，所以才被放逐到印第安

那州。當時我連印第安那州在哪裏都不知道，反正只知道在美國的中西部。我到了印第安那大學之後，同事對我非常好，問我能不能教元曲，我說可以；問我能不能教明清史，我說可以；問我能不能教小說，我說可以。什麼都說可以，只好不睡覺惡補，從中得到生命中另一個啓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不是“五四”幾位作家那麼簡單就可以講明白，“五四”作為反傳統的精神，已經意識形態化了。

也因為這樣，我開始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極大的興趣，我寫過一篇文章《生命中的三本書》，其中一本是《卡拉馬佐夫兄弟》，另一本就是劉鶯的《老殘遊記》。我認為《老殘遊記》可以說是代表中國十九世紀末的唯一一部小說。這個觀點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人講出來，從這裏我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是一個很錯綜複雜的課題。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本身並不是純的文學，不能把它和歐美的現當代文學作比較。它背後有各式各樣的文化因素和系統，再加上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非常密切。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需要把握個人的研究方法。對我來說，研究方法是學術追求上必要經過的一個階段，但并非把方法看作一種權威。那時我在美國中西部的時候，非常喜歡印第安那大學，因為布魯明頓（Bloomington）是個音樂城；後來更莫名其妙被請到芝加哥，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三個震撼。

一到芝加哥，我發現那裏的教授，包括我的好朋友余國藩教授，都對理論非常精通。書店裏擺在前臺的都是理論書。我當時對理論一竅不通，才感受到如果要在美國教授文學的話，多多少少要有理論的基礎。所以我當時的辦法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在圖書館自己開始讀理論。後來發現當時亂摸理論的經驗，與同年的幾位朋友如鄭樹森的經驗十分相似，總是以中國文學為出發點。所以我們接觸理論的時候，對於相當抽象、以語言為主的理論幾乎是完全進不去的，反而對與文化社會有關係的東西卻一下子便看出來了。後來我才知道幾乎每個像我這樣

讀理論的人都是先看盧卡契、Raymond Williams 再看 Jameson。到了 Jameson 就比較麻煩了，因為他的語言非常難懂。

在芝加哥大學，理論是極先鋒的，幾乎所有歐洲理論傳到美國都先到芝加哥大學，包括人類學、結構主義，後來是後結構主義。所以那時看到 Jameson 研究魯迅《狂人日記》的民族寓言那篇文章，頓時出了一身冷汗——為什麼外國的學者可以把《狂人日記》解讀得這樣精彩，雖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解讀，但覺得非常妙，竟然能把“吃人”讀成很重要的寓言！所以我開始感受到當時的西方理論，並不如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高高在上；每一套理論都有它的細節、它的傳統。而所謂西方馬克思理論，其實對中國的文學研究有非常可以相接合的地方。不過他們所用的方法，幾乎是和中國庸俗的馬克思理論背道而馳的。國內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反映論——文學是反映社會現實的。既然“文學反映社會現實”，那麼“對於文學內部應怎麼研究”？我認為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亦即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引出的問題：文學的形式、文化的沉澱和繼承與建制的關係到底是什麼？能不能從文學形式看到背後文化的視野？西方做學問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就是一切從文本出發。一個文本或一堆文本，它的歷史背景如何進入文本？用 Jameson 的說法，歷史是從一種無意識的行為進入文本的，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到現在為止還未完全解決，不過很多學者都在做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另一個研究文學的基本危機，就是文本讀得不够。這一點我覺得中國學者占了很大的便宜，如果把文本當作歷史脈絡中的形式來看的話，我們需要知道足夠的文本。但在座恐怕只有王德威能做到這一點。如果從現代文學來講，在座各位都比我熟悉，因為中國訓練就是要讀很多。記得王瑤先生跟我說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就這麼一兩百部，就這樣全部讀完算了。在座

的陳平原教授恐怕全都讀過。在美國就很難一下子讀這麼多。但就只有讀得多，才能從這些文本之間理出一些細節和有意義的脈絡出來。

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第四次、以至第五次的震撼。我研究魯迅的書是在八十年代憋出來的，幾乎難產。這個時候又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捷克的米列娜。她後來跟我說，我是她最大的敵人，我們做了敵人幾十年，結果成了好朋友。她堅決反對任何用歷史的方法來讀文章，我們之間的分歧我把它叫做“內外之爭”。她認為所有的分析都應該從文本裏面看的。這是布拉格結構主義一個重要的傳統——就是文本的語言陌生化之後，所產生的文學性是獨特的東西。這些東西乃是從文本分析中才能發掘。而我們習慣的，特別是我這個半途出家的人，總認為文本不可能這麼純、這麼中立吧？語言背後總有其他因素吧？所以跟她爭了十多年，最後達到雙贏的局面——我進人文本，她也走出文本。而對我來講，我認為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就出現了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這個“專業”出現在八十年代，我對文化研究的解釋跟年青一代的美國學者不一樣，因為我故意把文化研究曲解。年青一代的美國研究者認為文化只是一個符碼，它只代表美國的政治：性別、階級、種族；所用的是解構的方式，或者用政治的方式來重新閱讀文本。要在文本中找出它的政治性，才有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不正確。

對於文化研究的推崇，從我的立場來講，反而很簡單——總算在文學裏可以討論文化了。所以我特別重視文化這個詞。文化在當時的美國幾乎有兩個意義，一是文化研究裏的意義；二就是當時我在美國芝加哥所讀的一些新馬的書籍，因為西方馬克思文學理論裏面也特別重視文化。而這個文化如果放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範疇裏面講，基本上是以生產為主的。文化作為很重要的一個生產元素——作家、作品在文化裏面扮演了非常重要